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回顾与分析

摘要：过去各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爆发原因有着不同角度的分析，从中英交流的历史冲突和隔阂到律劳卑事件的催化，从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到冲突背后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撞。但往更深的层面挖掘，鸦片战争的爆发其实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能单纯归因于某一因素。中国贸易制度的政治渗透、英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中英文化冲突、英国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理论的发展）、鸦片纺织集团利益合流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鸦片战争的到来。

关键词：鸦片战争；经济利益；文化冲突；贸易逆差；社会矛盾

1 前言 相关研究的回顾

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历来受到诸多历史学家的讨论和研究。其爆发的原因也被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在此简述已有的部分典型研究成果。

第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与中英的交流往来有关，禁止鸦片贸易更倾向于是一种偶然的契机因素。郑剑顺先生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一文中，指出清政府长期对于“夷人”的鄙视，包括清政府视外国为“藩服“，外人为“化外愚蠢”之人，对外人有着极具偏见性质的要求[[1]](#footnote-0)。李金明先生在《中英通商冲突与鸦片战争》中提到，英国政府为了改善对华贸易的条件，两次派遣使节到中国，然而先后因为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无功而返。清政府将英使访华视作“藩属朝贡”，只在乎如何“整肃威严，使外夷知所敬畏”，这让英国的使节认识到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错误认知[[2]](#footnote-1)。

不仅如此，马戛尔尼通过与中国官员的接触，发现中国当时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英国很容易摧毁中国的海防。阿美士德也在外交失败后认为，相比维持现状和放弃贸易，英国政府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案就是诉诸武力。而禁止鸦片贸易也让英国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契机，发动了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迫中国改变传统的贸易态度和方式2。

李金明先生在《中英通商冲突与鸦片战争》还提出了第二种观点——部分学者所指出的“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止后，英国政府为了维持贸易，任命律劳卑男爵为驻华商务总监督，但是律劳卑却违反清廷的规定擅自入城等，且面对卢坤的驱逐警告仍不以为然，甚至以护卫舰示威，最终发展成军事冲突，开始炮战。结果是英舰失败，大量英商的贸易也受到限制，不得不退出广州，律劳卑也染上疟疾去世[[3]](#footnote-2)。但虽然此战英舰失败，清朝却在这次冲突中暴露了严重的军事危机和海防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在英商的煽动和律劳卑事件的催化下，武力发动鸦片战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或者“复仇”1。

第三种观点则是直接强调了禁止鸦片贸易的直接影响。李金明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没有在两次外交失败以及律劳卑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发生，主要是因为鸦片贸易给英商带来的巨大暴利足以暂时维持英商或英国政府的心理平衡2。塞缪尔华伦在《鸦片问题》一书中讽刺地强调了鸦片对于英国和印度所带来的巨额价值。但是当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受到威胁时，以及在鸦片头子查顿的大肆煽动下，显然英国政府无法坐视不管，最终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

第四种观点是林则徐在禁烟上所采取的落后的法律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这同样在郑剑顺先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中提及，林则徐为了禁烟，下令一旦查出鸦片，没收船及所有财产，并且船上的人“就地正法”。这种株连的惩罚机制与英国法律相冲突，英国国内舆论也认为这是对其国家的污辱, 鼓吹要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改变态度, 强迫中国方面让步[[4]](#footnote-3)。美国商人给两广总督的联名上书中也提到过：“如果为了一斤鸦片而将船上所有的全法财产都没收, 还要夺人性命, 战争又如何能避免呢。”中英贸易最后因为具结和惩凶问题不得不停止，而停止中英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极为严重，严重削减了他们的一个市场生意。最终使得中英矛盾再一次高度激化, 促使英国政府做出武力侵华的决策。不光是郑剑顺先生，陶广峰先生也在《从中西法律的冲突看鸦片战争》中更加深入地解读了中国和西方在法律文化上的强烈冲突[[5]](#footnote-4)。

而笔者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并非局限于此，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挖掘战争发动的睥睨。

2 鸦片战争的其他深层原因

2.1 中国贸易制度的政治渗透

清朝有着其封闭的贸易政策，在其对外制度中，外国船只到了广东港口，必须先报总督监督，委官验收没有违禁物，发给牌照后，才能进入黄埔，开舱通市。虽然规则如此，但在大清的政治观念中，英国作为一个朝贡国，就应当遵守天朝法律，而我大清，不愿接收你的货物，你便只能作罢。

再者，在中英往期贸易的货物类型上，西方带来的是大呢、纱、钟表等对生活无足轻重的奢侈品，而带走的却是的生丝、大黄、茶叶、陶器等必须的生活资料，因而在清朝的观念中，这种贸易物品的差异性，是英国对大清依赖的一种表现，因而在贸易过程中，更显得傲慢无礼[[6]](#footnote-5)。

而英国人在追求“平等”贸易时处处受尽凌辱，使得他们改变了既有的开拓中国市场的方针，因而转向武力，用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

2.2 英国长期的贸易逆差

过往国力的强盛，让大清一直沉浸于贸易顺差的美梦之中，而中英正常贸易阶段，顺逆差事实也确是如此。

1760到1833年，中英贸易增长迅速（其中鸦片占英国货物一半左右[[7]](#footnote-6)，含有走私成分）。进口贸易增加15倍，而出口贸易增加只有 9 倍，这便演化为中国每年出超 300 万两以上，使得英国不得不向中国送来等价白银，以抵补在贸易中的逆差。这也意味着，英国如果仅仅依靠商品贸易，是无法完全打开中国市场的，并且在中国市场的探索过程中，自己会一直处于逆差的不利地位，这样的贸易过程会极大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收益与发展，因而英国人迫切希望用更多极具依赖性的鸦片突破中国市场的藩篱，从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在此逆差贸易背景下，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便直接打击着英国自身资产阶级的发展，因而在为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英国不惜发动鸦片战争。

2.3 中英文化冲突

一方面自然是一两次外交为核心的礼仪贸易冲突，毕竟，曾经的世界游戏规则制定者很难接受“上贡者”对世界秩序话语权的夺取。另外一方面，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英双方对鸦片的使用及贸易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当时英国人的思维中，鸦片只是辅助放松娱乐的麻醉药品，并不是精神毒品，其对人基本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可在中国人固有观念中，可以对精神产生影响的药物都是巫术药剂；并且因为烟草的吸食极大影响了农业的产量及发展，使得鸦片同受牵连，在国人中多以麻痹劳动力，极易上瘾的负面形象所出现。

由此，鸦片的贸易便成了中英战争前的最大博弈点，英国始终认为鸦片贸易是正常贸易，而清政府却认为其是需要控制贸易量甚至禁止的非法贸易，从而渗透着文化差异的经济利益再一次成为战争的导火线[[8]](#footnote-7)。

2.4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理论

除了中英贸易过程中双方的相互抵触之外，英国本身阶级矛盾也蕴含着战争的诱因。

当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在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广泛传播[[9]](#footnote-8)，而且它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剥削的丑态；欧文的理论驳斥着马尔萨斯提出的，因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从而造成工人贫苦的谬论。 他直截了当的阐述了工人阶级生产的财富远远少于他们所消费的，因而这巨大的差额均由少数企业主所攫取，这使得英国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罪恶，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

工人阶级对生产产品的不买账，加剧过剩商品的大幅度滞销；且工人阶级的觉醒，影响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和平统治，为了转移或说缓和社会激化的阶级矛盾，英国资产阶级希望以对外战争重新整合英国内部的一体性，因而其走上了海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更是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2.5 鸦片纺织集团利益合流

侵华鸦片战争的到来，也有着英国内部利益集团合流的有利条件[[10]](#footnote-9)。

英国资产阶级主要有鸦片利益与纺织利益两大集团，由于两大集团的利益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对于英国的对华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边希望保持自身垄断鸦片贸易的地位，一边则是倡导自由贸易，主张向中国倾销棉纺织品。但两者对于侵华的观点，却不约而同的相似。就在前述欧洲工人阶级的不断觉醒条件下，“伯明翰政治联盟”的激进运动，以及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波澜，迫使两大集团放弃争吵，谋求合流，共同争夺市场；而组成的新的对华贸易体系，不仅企图完全打开中国市场，更是合力参与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的市场竞争。在合流态势之下，英国当局便迅速放弃稳健对华政策，以更强硬的态度，向中国贸易策略施压，最后借机发动鸦片战争。

3 结语

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并非从某个历史节点或者某个人物视角就可以简单得出。中英历史交流的冲突首先通过使节向英国政府传递了中国的落后信息。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鸦片这一形式，从中得到了大量收益，暂时缓解了英商受到的歧视性待遇的影响。但是鸦片贸易的受阻与中英文化的冲突让英国国内产生了大量采取武力的呼声，英国政府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强国地位，另一方面为了转移内部社会矛盾所引起的问题，最终通过了侵华决定，爆发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爆发，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都有其背后的潜在原因和铺垫，而鸦片贸易的禁止不光直接层面上切断了英国的利益来源，刺激了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想法，更是英国恰好借此改变中英贸易方式、解决国内矛盾的绝好机会，其爆发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郑剑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32-37，50 [↑](#footnote-ref-0)
2. 李金明：《中英通商冲突与鸦片战争》，《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第一期，45-53 [↑](#footnote-ref-1)
3. 郑永福：《律劳卑来华与鸦片战争》，《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38-43 [↑](#footnote-ref-2)
4. 郑剑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footnote-ref-3)
5. 陶广峰：《从中西法律的冲突看鸦片战争》，《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Z1期，74-80 [↑](#footnote-ref-4)
6. 李英全，齐远飞：《鸦片战争爆发原因新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28卷第6期，2017年11月，19-24 [↑](#footnote-ref-5)
7.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1983 [↑](#footnote-ref-6)
8. 陈红：《试从文明冲突视角下分析鸦片战争的爆发》，《才智》2016年第33期，214-215，217 [↑](#footnote-ref-7)
9. 陈少牧：《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再探》，《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78-81 [↑](#footnote-ref-8)
10. 董继民：《试论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因素》，《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30-36 [↑](#footnote-ref-9)